



“中华文明探源·何以中国”之发现篇③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 访谈

何努：证据链中寻找尧舜

本报记者 王慧峰

陶寺：中华文明开山之功

本报记者 王慧峰

在距今4300年前，一座巨大的城立于塔儿山西麓，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它就是帝尧和帝舜的都城所在。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不仅诠释了“最早中国”的概念，同时也初步建立起一条比较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陶寺为文献记载中的尧舜之都，使“尧舜禹”走出传说时代，正成为历史。

记者：历史上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外学界都认为尧舜禹是一个传说时代。

何努：是的。在夏商周之前，我们历史上有一个时代号称“传说时代”，也就是包括尧舜禹时代在内的五帝时代。这个时代到底是不是一段中国信史，大家一直在探讨。

如果要探索尧舜禹是否存在，首先我们要有一个突破点，就是他们的都城在哪里？经过四十余年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我们已初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考古文献—人类学证据链，指向陶寺都城遗址为尧舜之都。

记者：这个证据链是如何一步步完整扎实的？

何努：关于尧都，我们文献上记载是有的，但有多种说法，其中有几种说法得到的认可较多，其中一个就是《水经注》提到尧都平阳。对于平阳在哪儿，大家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就是现在山西临汾一带。此外还有很多其他说法，比如山东定陶、河北唐县也有尧都之说，豫东南地区、晋南的芮城地区还有舜都之说，等等。但仅从文献角度确定尧舜都城到底在何处，很难定论。

因此，我们首先进行人类学的考古探索，也就是先探索一处遗址它是不是一个都城。在确定了它是都城之后，也就是回答了人类学的考古问题之后，就要回答下一个问题，也就是进入历史学话语体系里考古的范畴了。

关于陶寺是尧都早有学者提出这个观点，但缺乏系统过硬的论证。我们要把这些发掘出来的考古资料和相关文献记载形成一套证据链，同时结合当地的人类学材料，包括当地民俗、传说、方言、地方志、地名、家谱等等，这三股证据链拧成一股绳，指向同一个趋向，最终得出结论。

记者：已有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证明陶寺最有可能就是帝尧都城所在。人们自然会接着问“舜都在哪儿”？

何努：陶寺作为尧都的证据是越来越多的，但是陶寺不只有早期，它的中期则成为更大的都城。如果陶寺早期是尧都，那么中期是谁的都城？有文献记载说“尧舜并都之”。《尚书序》孔颖达提到舜的诞生和虹有关，虹在甲骨文中被描绘成双头龙或者蛇，而我们在陶寺遗址中期IIM22出土的双头龙玉佩，恰好与之对应。

而《说文》曰：“舜，帅也……蔓地连华。象形。”我们在陶寺中期贵族墓出土的双耳罐上，就发现了蔓地勾连花纹，不妨推测这种纹样是舜王族的标志。

文献记载舜统治时期有牛、仓廩、牛羊与宫室等，而这些在陶寺遗址中都有考古发现。综合考古发现以及文献记载，我们认为，陶寺很可能是传说中的尧舜之都。

记者：中国考古学已走过百年历程，您从事考古事业40多年，主持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也整整20年。一定有很多心得感悟分享。

何努：一百年来，我们的国家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我们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化有了认识，也因为有了考古而全然不同。一百年前，史书中中国历史的开端是三皇五帝、尧舜禹汤，而经过考古人的发掘与研究，我们在地层中逐步找到了中华文明最初的模样，找到了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而这，也就是寻找古老中国的意义所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

中国的考古学界最终无法逃避回答传统文献中所说的“三皇五帝”文化、社会、历史是否曾经真实存在过。假如“三皇五帝”确实是秦汉人虚构的，考古学如何来证实？假如“三皇五帝”是真实存在的客观历史，那么考古学又如何来证实？这都需要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论层面上专门的探索与思考。

新时代，我们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只有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治理智慧，我们才能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遗迹还要早500年，是世界上最早观象台。在何努看来，在体现农本、民本的同时，观象台也是王权科学软实力的一部分。

此外，陶寺都城遗址王族墓地出土的圭尺和圭表，组成了世界最早的天文测量仪器圭表系统，不仅可与陶寺观象台相辅相成地制定历法，更重要的功能为通过测量夏至日影判定“地中”。陶寺圭尺第11刻度长度为40厘米，合陶寺1.6尺，是四千年前晋南地区的地中标准刻度。这个地中刻度的存在，表明最初“中国”概念的诞生——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有所变化，然而不变的基因是对地中、中土以及‘地中之都’‘中土之国’的观念认同。因此，判断最早中国的标准，应当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观念的出现。”

何努认为，以地中概念为核心的“中国”概念，被夏商周三代继承与固化，并成为夏商周三代“统一多民族”王朝国家的“国家认同”，标志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核心主干，在中原地区最终形成，瓜瓞绵绵，不断发展迭代，以致今日之中国。

考古学上的国家概念判断的核心都为都城，都城应有城墙、宫殿区（宫城）、大型宗教礼制建筑（天坛、观象台、地坛）、王陵区、工官管理手工作坊区，同时还应该有政府掌控的大型仓储区（国库）和普通居民区这些指标。“根据发掘的成果来看，陶寺社会贫富分化悬殊，少数贵族大量聚敛财富，形成特权阶层，走到了邦国时代。”他说。

“我们可以非常自信地认为，只有陶寺是有物证来证明陶寺就是最早‘中国’。”何努说。

“开山之功，功不可没”

“君处庙堂之高，锦衣玉食。民居江湖之远，一贫如洗。”

“到了中期，城中掌权者易手。城址扩大数倍，社会更趋繁盛。官营的手工作坊里，工匠们从事重要石器工业和制陶生产，最初的文字被用于国家管理，表现为官职的标志。”

“文明持续300年，不料一朝衰落。乱世者，毁宫殿、扒城墙、挖坟冢……”

考古学的作用更像是开启关于人类过去的另一幅历史画卷，它同历史文献是相互辉映的，同时这幅画卷也更加丰富和立体。

考古最吸引我的，是我可以跟4000多年前的人物对话。在何努看来，这样的快乐很少有人能够体会。

据先秦文献记载，当时的“天下”，是指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对此，人们往往以为出处不清，不足采信。何努通过陶寺遗址的圭表实验推测，推断该套地广数据是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为中表的四表之间的实测直线距离。尧舜举全国之力，派出羲叔、羲仲、和叔、和仲完成了这项天文大地测量，理想化的国家政治版图正是由圭尺“中”来实现。

通过对时间与空间的精准管理来为王权与社会政治服务，成为陶寺邦国政治与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陶寺邦国的时空政治文明核心基因就是经天纬地，标志着中国文明中政治与制度文明对时空管理的肇端，被后世历代王朝继承完善。”何努表示。

“陶寺文化对中国文明主脉的贡献，在制度建设层面上集成创新的贡献是巨大而深远的，更加证明陶寺文化是中华文明主脉核心形成的起点，其各项制度的集成创新是关键。”几十年来，通过分析都城制度、宫室制度、礼制建筑制度、府库制度、住宅的等级制、丧葬制度、礼乐制度、铜器制度、天文历法垄断制度、度量衡制度、工官管理制度，何努得出结论，那就是陶寺全方位地奠定了后世中国历代王朝的制度建设基础，并形成了一些中国文明当中制度文明传承的稳定基因。

“中华文明五千年，瓜瓞绵绵，其中制度文明基因的继承与发展，至关重要，而陶寺文化制度文明继承创新的开山之功，功不可没！”他说。

的时空关键点，我国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将其所在的文化区间视为“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他曾说，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历程中，作为帝尧陶唐氏文化遗存的陶寺文化，构成一个伟大的历史丰碑，它是中国正式迈进文明社会的界碑石。

“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陶寺，已是实证5000多年中华文明历程的重要支点和基石。

“最早中国”

在至少280万平方米面积的遗址中，空前规模的城址、气势恢宏的宫墙、布局规整的墓地、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迄今为止最早的汉字、组成成套的礼器、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在何努的讲述中，一个早期国家都城的盛大气象跃然眼前。

“从目前的考古研究来看，陶寺是‘最早中国’。”何努说。

近些年来，随着中华文明起源考古探索的逐步深入，“最早中国”之争成为持续火热的话题。种种考古迹象足以表明，陶寺在4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早期国家的形态，迈入了文明社会，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初级文明阶段的都邑性城址。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国”。

“中国古代的‘中国’概念，不是民族国家范畴里的‘中国’，诞生于西周《何尊》铭文‘中国’之前。”何努向记者解释，“中国”概念最初的诞生应包括“中”和“国”这两个概念：“中”是地中的概念，“国”则是国家社会形态及其国都。

2003年，何努和同事们发现了一座古观象台，其位于陶寺古城遗址东南方向，有3个圈层半圆形的夯土结构。第三圈内的11座夯土柱由西向东呈扇状辐射排列。古人透过柱与柱之间的缝隙观测正东方向塔儿山日出的半切或下切，以此来确定当时的节令，为社会生产生活提供最基本的服务。这与《尚书·尧典》中“观象授时”的记载恰好相符。

按照考古专家和天文学家的初步结论，该观象台建造于公元前21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比目前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天象崇拜

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支点

1978年，位于山西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的塔儿山西麓，考古工作者用手中的探铲和手铲，翻开了厚重的黄土地，开启了一段事关中华文明起源的重大考古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中原与海岱地区文明进程研究”课题负责人何努担任陶寺考古队队长已整20年。20年，于浩瀚五千年，不过转瞬之间，但对一个学者而言，便是半生心血的倾注。

2001年9月，提前一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何努第一次来到陶寺。那时的他没有想到，从此以后自己的人生与这片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转年，何努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队第三任考古队长，主要负责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

“一些出土器物，显示了陶寺在精神、文化和技术上达到的罕见高度。”一贯谦和沉稳的考古学家，每每谈到那些4000多年前的点滴便神采飞扬，娓娓道来不知疲倦。在他的讲述中，一个宏伟的史前城址穿越时空，缓缓向我们走来。1958年，考古人在襄汾陶寺村进行调查时，从大量散落于地面的灰陶片发现了这里可能存在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20年的多次复查探查求证，陶寺终于在1978年开启发掘，这次发掘持续到1985年，以发现龙山文化时期最大的墓地，一举轰动考古界。陶寺文化，由此正式成立。

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一扁壶残片，残片断茬涂朱，扁壶外壁上朱书两字，早于甲骨文500余年。朱书文字将汉字的出现至少推进至4000多年前，被视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此外，最早的中国龙形象，即见于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蟠龙纹陶盘。

规模空前的城址、黄河中游地区最大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中国最早的石磬、陶鼓、鼗鼓礼器组合、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不断丰富，学界对陶寺遗址及其所体现的中华文明根脉的认识也更加深刻。

陶寺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



考古人员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宫城遗址考古发掘作业。 黄河新闻网临汾频道 李现俊 摄



距今5000年前后，华夏大地上满天星斗般的文明之光向黄河中游聚合。约从4300年前开始，河汾之东，陶寺人夯土建都。土城恢宏，人口密集，规划井然，社会分工明确，初现王权和礼制，中国早期国家基本面貌显现。

自1978年开始，考古学者持续对地处黄河中游、晋南盆地的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展开发掘与研究。自2002年陶寺遗址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来，陆续发掘出早期城址、宫殿区、仓储区、中期小城内外大墓及观象台基址。从这座距今4300—4000年、规模不断扩大的都邑遗址上，学者们不断破解着“最早中国”的文明密码，深化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



人民政协报微信公众号 更多报道见

文明探源·委员漫谈

地处黄河中游的山西，是一方文明的沃土。黄河与太行护卫着左右，使之成为汇聚中原、关中与北方草原地带多元文化的长廊和宝地，而流经其中的汾河平原，则成为发育农业和城市乃至国家文明的摇篮。为此，在近年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课题中，山西当然成为世人瞩目之处，而陶寺遗址又是其中的一位“骄子”。

去年9月，全国政协“不可移动文物的综合保护与利用”调研组在刘奇葆副主席率领下到了陶寺，我有幸作为其中的成员，在遗址现场听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陶寺考古队队长高江涛博士的介绍，也目睹了考古学家们在此发现的4500年前左右的城垣、宫殿、观象台以及墓区等重要遗迹。当时，站在遗址上，想着脚下这块土地竟然埋藏着一座神秘的“文明古都”或“尧都”，还被专家们誉为是“最早中国”所在，不由得对发现和认识这一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史上拥有特殊地位的遗址的考古学家们产生深深的敬佩。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城东北约7.5公里处的古崇山（今俗称塔儿山）西麓。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50年代初，已被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发现，并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又经过三次复查，但是那时的人们还没想到它

向那些发现“陶寺”的考古学家们致敬

贺云翱

但是当时主张发掘陶寺遗址的决策者却是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

苏秉琦先生和夏鼐先生都是对中华文明起源有着特别研究和贡献的著名考古学家。苏先生写过《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夏先生写过《中国文明的起源》，都是享誉中外的名著。陶寺遗址考古后来能有惊人的发现，离不开这两位考古大师的指点。如果让我们把目光回望一下，其实早在1925年3月，有“中国考古学之父”之称的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代表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开展的第一次考古发掘，选择的就为探索“夏文明”而开展工作的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确实，在陶寺遗址发掘之后的研究中，仍有诸多先生认为：陶寺可能就是历史文献记载中的“夏墟”，是中国夏文明的开启之地！

1978年到1983年，陶寺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是在高炜先生主持下展开的。这次发掘的主要成果是“确立了陶寺文化”，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600年—前2000年或公元前2500年到前1900

年间，又“理出晋南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为陶寺文化的脉络”，关键是获得了一批极其重要的材料，“遇到过去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甚至想都想不到的一些现象”。

在2000年左右，梁星彭先生在陶寺遗址发现了夯土基址和城墙，确认陶寺是龙山时代规模最大的城址，使陶寺考古在此获得重大突破。同时还新发现一处墓地，墓中出土铜齿形器、玉璜、玉琮等礼乐重器，从而认识到陶寺可能是4000多年前的一处重要都邑性城址。

陶寺考古中更重要的一个时期始于2002年。从这年起，考古学家主动按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课题的要求，采用聚落考古、科技考古、环境考古、天文考古等多种方法，相继发现陶寺早期城址、围在中期城垣内的独立贵族墓地、更丰富的玉器与漆器随葬品、宫殿建筑遗迹；尤其是中期小城祭祀区内出现的形状奇特、结构复杂、气势宏伟，可能集观测与祭祀功能于一体

的大型建筑遗迹等。主持这一时期考古工作的何努先生等依据这些新的发现，认为陶寺文化兴起时就直捷伴随着城址的出现，这意味着陶寺文化从诞生之时就打上了“都邑文化”的烙印。

2010年，陶寺考古及其文明探源的“接力棒”交给了年轻的考古学家高江涛博士的手上。他在前辈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思路，寻求更新突破。结果发现了手工业区的大型“官署”建筑和一座近13万平方米的宫城遗迹，这一重大发现向人们展现了陶寺古城复杂的空间结构和中国最古老的都邑宫城建筑形态及其布局。该发现也因其特殊价值而入选2017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2021年9月，我们一批全国政协委员也见证了陶寺文明探源考古的历史。站在陶寺遗址上，听着高江涛博士娓娓道来，那确实是一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自信和深情，因为“几代人”的努力，他们发现了“最初的中国，华夏的主脉”。那天，在离开陶寺遗址的时候，我又回想着渐渐远去的考古现场，那里似乎闪现着李济、夏鼐、苏秉琦、张彦煌、高炜、何努、高江涛等一位又一位考古学家辛勤的身影，没有他们的相继付出，“陶寺文明”之谜不知道还要到何时才能解开！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